

江桥抗战中马占山的战与“降”

□ 周彦 王硕

对于马占山在江桥抗战中违命抗战、降日、再举义旗具有传奇色彩的行为,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特别是在东北的学术界,始终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与事。战,是关于江桥抗战是否是打响中国军队武装抗战第一枪的争议,对所谓“降”,主要是对马占山主观动机的探讨。有人认为马占山降日是情势所迫的一种斗争策略,近于诈降的行为,也有人认为马占山是真降,但并未做有害于国家与民族的事情。本人认为,马占山的战与“降”行为,应当是由多种因素促成,客观环境固然重要,但面对同样的环境,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其差别主要是由其个人品质与性格特点所决定的。



马占山

1931年10月,马占山临危受命,出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率所部黑龙江守军,抵抗日军侵略。江桥抗战,震惊中外,一时举国援马,世界注目江桥,马占山可谓一战成名。

江桥位于吉林与黑龙江接壤的交通要冲,是日本进犯黑龙江省城的门户。1931年10月19日,马占山到达齐齐哈尔,在21日

的就职仪式上马占山宣布:“目前最主要问题,即为维持地方治安,望各群策群力,共同赞助,各司其事,各尽其责。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治安者,决以全力铲除之,以尽我保卫地方之责任。”^[1]10月22日,马占山在《抵抗宣言》中再次表达了抗战的决心:“当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救危亡……尔后从侵我江省境者,誓必决死一战。”^[2]

江桥抗战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关于江桥抗战的起止时间及规模在学术上有一定的争议)。第一阶段是从1931年10月16日至11月3日,作战双方为张海鹏叛军与江桥守军,主要指挥者为参谋长谢珂。第二阶段从11月4日至19日,主要抵抗日军为主力的进攻,主要指挥者为马占山。战役主要在江桥到齐齐哈尔沿线的大兴、汤池、三间房、昂昂溪等地进行,11月中旬,江桥抗战进入高潮。从11月12日至14日,日伪军对三间房发动的数次冲锋均被我军打退。17日,日军出动多架飞机,100多门大炮,士兵7000余人向我方阵地发动疯狂进攻。4000多名中国军人沉着应战,血战三间房阵地。

18日的战斗更加惨烈,我军击退日寇十多次猛攻,直至与敌白刃格斗,最后守军仅剩2000余人,傍晚,马占山率部退守齐齐哈尔。19日上午,日军集中主力直扑齐齐哈尔,黑龙江守军拼死抵抗,终因敌力量太过悬殊,弹尽粮绝,被迫退出省城,江桥抗战至此结束。

江桥抗战中,马占山表现出了具有正义感的中国军人的优秀素质,以及作为指挥者应有的领导组织能力。在11月18日激烈的战斗中,日军出动8架飞机轮番轰炸,危急关头,马占山、谢珂先后亲赴大兴、三间房阵地督战。1931年出版的《国民周报》第八卷称赞道:“(马将军)非不知远道援兵之不易达,亦非不知日军增援也,然而重守土之职责,宁战而亡,不为所屈,当零下数十度之严寒,率疲弱之孤军,竭其最后之力,以拒敌守土,前赴后继,苦战恶斗,以迄最后一弹为止……”^[3]在马占山带领下,守军同敌人展开殊死搏斗。

江桥之役虽败犹荣。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影响是空前的,国人反响强烈,给抗战以高度的评价,马占山更是“一跃成为驰名中外的抗日英雄”,被视为“将土之楷模,国民之表率”,“东方的拿破仑”,成为中国30年代初期一位叱咤风云的抗日民族英雄。

1931年11月17日的《滨江时报》以“马占山万岁”为题发表评论文章,盛赞马占山及所有参战官兵,呼吁中国军人学习马占山,做捍卫国土的勇士。写道:“嫩江河畔的赤血,都是我们中国血性男儿的瑰宝,江桥上面枕尸,他们都唱着为国而死的挽歌,先

谈。此外,他为使岭大摆脱外国教会的控制,收回办学自主权,提高华人地位作出的重大贡献也深得华侨赞誉。再加上钟荣光生活简朴,对自己要求严格,虽然在海外募捐时经常“腰缠万贯”,但是他抽的是手卷土烟,吃得也很随便,所乘车船及往返路线都要精打细算,因此海外华侨也都放心将钱捐给他。

3. 岭南大学劝勉华侨捐款举措良多。钟荣光为募捐活动不仅亲力亲为,数次出国募捐,走遍南亚及南北美各地方,而且募捐形式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通过侨生宣传吸引家长捐款,岭南大学鼓励侨生与家长通信,加强交流,让华侨家长觉得子女在学校得到很好的照顾,进而愿意捐款助学;二是通过聘任校董的方式来吸引华侨募捐,钟荣光曾聘请爱国华侨马应彪为首任唯一的华人校董;三是成立“岭南学校共进会”,“岭

南共进会”等组织,然后通过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募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 开设岭南大学附设华侨学校,招收华侨子弟。为了答谢侨胞对岭南大学的支持和爱护,服务华侨子弟,提高华侨教育水平,满足华侨社会教育发展的需要,岭南大学于1918年特设华侨学校(华侨班),专门接收华侨子弟回国求学,此举开创了我国大学华侨教育的先河。岭南大学规定,“凡生长及侨居海外者,自十二岁至十八岁之学生,无论程度深浅,尽可收录”^[4],侨校的低门槛受到海外侨胞的热烈欢迎,侨生人数与年俱增,据有关档案资料记载,1932年的侨生人数达到140多人^[5]。岭南大学附设华侨学校推广华侨教育的显著成效换来了海外华侨更大的支持和爱护,后来还应海外侨胞的强烈要求在海外开设了星洲(新加坡)和安南(越

南)分校。

综上所述,钟荣光的海外华侨募捐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其历史客观性,但也有自身的积极主动性。钟荣光为岭南大学的募捐及促进岭大的现代化的种种举措成就了岭南大学,也成就了自己,使自己成为与蔡元培、张伯苓等比肩的教育家。海外侨胞的助学行动不仅使岭大获得了办学经费,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屹立不倒,更为我们留下了一座座美丽的校园建筑,这些成绩都将永载史册,共同见证岭南大学与华侨之间的深厚情缘。

参考文献

[1] 黄蔚松,近代广东教育与岭南大学[M],香港商务印书馆,1995.
[2] 陈安仁,岭南大学年表[M],岭南大学发行,1935.
[3] 李瑞明,岭南大学[M],香港岭南(大学)筹募发展委员会,1997.
* 作者簡介: 郑翰君,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博士; 张志华,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着我们而牺牲了,黑龙江的中国军队,可以说是真正的捍卫国土的勇士……中国军人马占山先生,你鼓着勇气,洒着热血,在这白山黑水之间,孤军奋斗,你的英勇,是值得四万万同胞敬仰的……中国军人呀!中国军人的魂呀!马占山已经戴着警钟,请你们起来,布告上的保国卫民,要希望你们去实行呀!最后我们高呼着:中国军人马占山万岁!”^[7]

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陶行知先生在其创作的《敬赠马占山主席》一诗中,盛赞马占山:“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气兴衰,手抛日球归正轨,十二金牌召不回。”^[8]

上海音乐家协会还专门为黑龙江守军谱写了《马家军之歌》,马占山的名字随着动听的歌声传遍了大江南北。上海裕昌烟草公司特别生产了“马占山将军”牌香烟,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说:“伟人名烟,并垂不朽。”

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发起的首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抗日阻击战,称之为打响中国军队武装抗战第一枪是名至实归。由于黑龙江守军敢于冲破“不抵抗”禁令,坚决打击日本侵略者,使得日本关东军在付出伤亡千余人的代价后,才得以占领当时的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从而延缓了其北进龙江、南取锦州的步伐。尽管江桥抗战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政策”,但它却极大地鼓舞了东北人民的爱國热忱,促进了各地抗日义勇军的兴起。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讲的:“马占山在东北三省的抗日行为,也是统治者阵营中的一个分裂。”^[9]江桥抗战为国民党军队树立起一面进命抗战的旗帜。

马占山的战,进命抵抗,孤军奋战,更显英雄本色,故江桥抗战震惊中外。因为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抵抗,张学良的东北军不抵抗,辽宁吉林两省主席投降,不是一月东三省几乎失去两省。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马占山的抵抗震撼世人也是必然结果。虽然,此后马占山在抗日辉煌和国民政治舞台上,并未继续自己的辉煌,但是,始终不渝地为抗战和平民生尽力,所以,依然受到国人的崇敬。对于马占山的战,如果我们仅用学术态度去审视这一历史过程,似乎过于理性了和麻木了,在民族危亡之际,对历史人物公正评价的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民族的良知。此举,不论马占山出于怎样的思想动机,产生怎样的结果,马占山都是当时中国最高大的人!马占山的战,是为民族而战,纪念马占山及与他

共同战斗的战友们,是对民族精神的膜拜,这应当是关于江桥抗战和马占山研究的思想精髓所在。

二

马占山“降日”行为与其战的悲壮并存,对于两者似乎矛盾行为的争议,主要是对其思想动机的认识上,并不特别在意其后果,因为无人否认也没有理由否认马占山是抗日的,只是想为马占山反差如此大的行为找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答案,似乎不应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的事情发生了,对于长期以来人们形成的对英雄的形象是一个挑战,这也是此问题长期争鸣而难以达成共识的原因。其经过大致如下:19日,马占山率部从齐备齐哈尔撤出,22日,在海伦重组抗战政府。此后,接连作战的失败,马占山感到大势已去,迫于日益严峻的环境压力,马占山到哈尔滨会见多门,提出停战和处理黑龙江省的条件。

1932年2月6日,马占山接受张景惠的劝告,响应咸武仪的“联省自治”号召,16日到沈阳参加由马占山、张景惠、熙洽、臧式毅参加的“四巨头会议”。会议没有讨论蒙省自治问题,而是通过了所谓的“新国家”建设大纲,马占山知道自己中了圈套,以头疼为名,没有参加起草所谓的“独立宣言”和签字,18日,返回海伦,24日就任伪省长,3月9日参加伪满洲国成立典礼,被告委任为伪军政部长兼黑龙江省长。

第二天,日本发出公函,要求马占山对黑龙江省一切事务不得擅自做主,必须取得顾问同意方可实行,致使马占山处于严厉控制之下。4月1日晨,马占山率官兵二百余人携带两署关防印信、重要文件、军饷等重要物资出走,再次举起了抗日的旗帜。7日抵达黑河,通电反正,重新组建黑龙江省政府和军署机关,重新举起了抗日旗帜。直至1932年底,兵败退入苏联境内,结束了马占山一生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影响的经历。

对马占山的所谓“降日”问题,有的学者认为马占山是在日本人的高压下上了贼船,成为日本的降将,即真的降了,但马占山能审时度势,很快反正,再举义旗,从历史发展观进行考察,马占山还是民族英雄。对此,从目前研究的状况来看,并无多大的争议,多数学者认为马占山“降日”是由于环境所致,是有计划地由日本人周旋,是投降,是一种斗争策略,只是在阐述的理由上有所不同。马志伟在其所著的《马占山将军传》中,对马占山的“降日”,认为是其父的艰难选择,不得

己而为之^[10]。

本人认为,马占山降日行为是面对抗战严峻形势的一种策略选择,这是与其成长生活经历及个人性格特点密切相关的,看似矛盾的行为是有其性格与行为间必然的因果关系。

马占山出身绿林,从其发迹经历中可以看出他的个人性格,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的主流品质。马占山既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又具有敢作敢为能屈能伸的心理素质,决定了他行为的我行我素,同时,也有必要从其一生的行为来认识江桥抗战时期的马占山,即正义感与追求和平进步。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其抗日、降日、反正,是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马占山个人性格使然。战,使马占山人格的力量是在江桥抗战那一刻展现出来了,是机遇,更是本性。降日,对马占山而言是一种并不注重行为方式更注重其本质思想支配下不拘一格的性格特点所决定的。马占山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即使在“降日”期间,马占山没有做过对不起民族和国家的事情,因此,不必苛求于马占山。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角,在史学研究中常有这样一种现象,人们对于某一历史事件或人物的研究到一定程度,研究的重点会逐渐从事物的本身转向对当事人内在品质的深刻分析研究,更多地体现历史研究中的个人思想与个性化探讨,从而赋予了历史研究中更多的感情色彩,历史留下来的不再是残破而无穷尽的历史记录了,而是对历史过程中人性的解读。江桥抗战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的历史事件,随着时间的流逝,如今,似乎离我们渐行渐远,马占山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正是体现了这样的认识理念。从对民族英雄的仰视与崇敬,到对其人生成长历史关注,从其民族精神的歌颂与赞颂,到对其并不完美的个人性格及行为的认可与包容,我们对马占山与江桥抗战的研究正在走入这样一个境界。在走进马占山内心世界的过程中,也改变着我们的认识,感受着江桥抗战中人性的光辉与人格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 [1] 国民党高级将领传[M].解放军出版社,1995.
- [2] 民国周报第八卷[N].1931.
- [3] 滨江时报[N].1931年11月7日.
- [4] 原载于上海《生活》周刊[1].1931年11月17日.
- [5] 新中华报[N].1939年12月30日第三版.
- [6] 周厚.江桥抗战及近现代中日关系研究[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 * 本文为齐齐哈尔大学文科科研项目“江桥抗战学术与应用研究”,课题号:080004.
- * 作者简介:周厚为齐齐哈尔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瑛为齐齐哈尔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